

汗血宝马: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

潘春辉

摘要 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发现汗血宝马,自此之后,围绕汗血宝马在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之间展开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汗血宝马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扮演着不小的角色。侯丕勋教授的新著《汗血宝马研究》是对汗血宝马的一部专门系统性论著,本文对此书作了评介。

关键词 《汗血宝马研究》 侯丕勋 汗血宝马 丝绸之路 文化交流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史称“凿空”,这在我国古代中外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中原王朝与许多西域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揭开了新的一页。史载,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宛国发现汗血马,将汗血马的信息带回中原。自此之后,围绕汗血马,在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之间展开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伴随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汗血马不断传入中原,成为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2000年7月5日,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赠送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汗血宝马阿赫达什,被誉为“土中两国和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2006年4月2日,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赠送汗血宝马,续写了中土友谊的新篇章。从张骞出使西域,至今,汗血宝马一直在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有关汗血宝马古老和新颖的故事始终为我们满怀热情地传颂。由于汗血宝马“汗血”独具的生理特征、超凡脱俗的体质等难以破解的奥秘,两千多年来一直吸引人们的关注。汗血宝马究竟起源何地?如何传入中原?其躯体“汗血”到底是什么?其在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不为人们所熟知。汗血宝马由此成为一个神秘的话题。侯丕勋教授的新著《汗血宝马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年),为我们解答了有关汗血宝马的诸多问题,揭开了两千多年来笼罩在汗血宝马身上的神秘面纱。该书以全新的视角,全面审视和系统构建了汗血宝马史的研究体系。全书共6章,分别为汗血宝马的发现、汗血宝马东入中原、汗血宝马诸奥秘的破解、与汗血宝马相关诸问题辨析、汗血宝马史事在中国的涟漪、汗血宝马史的新篇章。书后有两篇附录,分别为汗血宝马大事记、汗血宝马史料集萃。通读全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独辟蹊径,以汗血宝马史为视角展示丝绸之路中外文化的交流

汗血宝马问题,与我们传统学术研究中比较重视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等领域中的课题相比较,确实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课题。但从汗血宝马的发现至今,它延续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其间涉及古代中原与中亚诸多国家和民族,尤其是丝绸之路上的大宛、大夏、安息、大月氏、康国、石国、突厥、匈奴等。从具体内容看,汗血宝马问题,不仅仅只是有关马的问题,而是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民族、交通、文化等诸多方面。《汗血宝马研究》一书的独特之处就是突破了就汗血宝马而论汗血宝马的局限,将汗血宝马置于古代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之下,以汗血宝马为切入点,观察与汗血宝马有关的中原与中亚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往来。在此视角之下,我们看到,汗血宝马东入中原的历史,就是一部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因

此《汗血宝马研究》提供给我们的不只是关于汗血宝马本身的历史,而是给我们展现出一幅鲜活生动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画面。可以说,汗血宝马就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对汗血宝马史的探讨,实际上带动了整个古代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汗血宝马研究》这一独特的观察视角,向我们展示了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原与中亚各国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内容,丰富了我们对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认识。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作者进一步认为,当汗血宝马自西汉时东入中原后,汗血宝马文化就开始形成,并逐步成为中国传统马文化的主流和主要特色了。也就是说,早在春秋时期形成的中国本土马文化,在汗血宝马东来后就吸收和融汇了汗血宝马所带来的诸多文化元素,从而使中国本土的马文化逐渐发生了变异,最终形成以汗血宝马所代表文化元素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马文化。《汗血宝马研究》的这一观察视角,正体现了历史研究中“小处着手,大处着眼”之妙,实现了“小题大做”的目的。在此研究视角下,汗血宝马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事象存在,而是作为探究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透视点支撑着整个研究,体现出作者的匠心独具。

二、考镜源流,破解汗血宝马之谜

“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汉武帝《天马歌》)“大宛汗血古共知,青海龙种骨更奇。”(司马光《天马歌》)汗血宝马自发现以来,以其超凡灵性、矫健疾速、躯体“汗血”的特征,引起人们的关注,演绎出许多有关汗血宝马的神奇故事,在博物志、异物志、遗录、游记、见闻录、稗钞等野史文献中,将汗血宝马描绘得尤为神奇,以至于千百年来人们对汗血宝马的认识扑朔迷离。在古代,汗血宝马被普遍视为一种神奇之马,诸如它的来源、产地、名称、汗血原因、汗血部位及其生理特征等,似乎都神秘莫测。对这一系列汗血宝马的神秘之处,《汗血宝马研究》在系统总结以往认识的基础上,一一作出解释,将汗血宝马诸多神秘现象予以破解。如对汗血宝马的来源、“汗血马”、“汗血宝马”、“天马”名称的缘起、汗血宝马的原产地、汗血宝马“汗血”的奥秘等,作者在逐一评析以往诸说的基础上,以大量的资料作引证,给予令人信服的解释,体现出作者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勇于创新之处。这一点从作者对汗血宝马“汗血”奥秘的分析就可见其一斑。汗血宝马“汗血”的奥秘是学术界极为关注、广大读者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自西汉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史学界不少专家都曾试图揭开其奥秘,并曾提出了许多新奇的见解,歧见丛生,难判高下。作者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将汗血宝马汗血原因概括为6种,即“喝神秘河水流血”说、“毛细血管发达”与“体温升高”说、“蚊蠓吮噬”说、“毛色鲜艳”说、“皮毛红斑”说、“寄生虫致病”说。作者综合清 (下转第23页)

依次为：江东大埠头、百丈街后街徵君庙、百丈街后街打铁巷、泥堰头、石戏台跟、大校场。这6处的井水都受到周围污水的影响：要么井水浑浊，要么带有臭味，要么两者兼有。除了江东大埠头的井水“澄明而带微黄色无臭无味”外，其他5处的井水浑浊并带有臭味。实验报告书证明：泥堰头和大校场的井水“不适饮用”^{[1][2号,56-62]}。由于城区的水质差，加之自来水建设费用高昂，宁波市政府决定开凿自流井，并与上海的汉中公司订立《开凿自流井合同》^{[1][2号,78]}。该合同因为受到浙江省府的干预，而一度受到影响^{[4]9}。自来水未建成之前，需要多凿井，由于“经费亦浩大，一时未易实现”^{[4]10}。到1936年，城区公私水井总共只有28口^{[2][744-745]}。

2.政策方面。鉴于当时“所有的饮料用水，大多仰给于河流，而水质之清洁与否，关系保健卫生”的考虑，浙江省民政厅日字第五七二号令规定：要保护饮料用水，以重卫生。当时的宁波市政府据此出台了《清洁河流以重卫生》的规定，并要求公安局和卫生警“切实查禁河内洗涤便器污物，并不得投弃秽物及死亡禽畜，以清水源而重卫生”^{[3][1930-5-13]}。此外，宁波市政府卫生科制定了《清洁饮料水规则》。该规则第一条明确其主旨是“清洁饮料水，保持公众健康”。该规则针对饮料水来源的不同而分为两部分。

首先是河川池塘湖水。《规则》对河川池塘湖水的保护规定，具体体现为“12条不准”，即：不得抛弃“一切污秽之物”、不得投弃“动物水族等皮毛骨肉内脏”、不得“洗沐牛马及纵放鸭鹅”、不得倾弃“一切废弃或腐败物品”、“不得洗刷污秽之物”、不得倾倒“用过之水”、不得“用不洁之器于水中取水”、不得“吐痰挥涕或便溺于水中”、不得将“有碍卫生的物质投于水中”、不得“裸体入浴”、不得将“污水沟渠通入水中”、不得将其他有碍清洁的物质“侵入于水内”^{[2][742-743]}。

其次是对食井的保护。该规则制定了五条，即：“距井一丈以内不准便溺及洗涤便溺器”，“距井一丈以内不得倾倒各种污水”，“距井一丈以内不准淘米洗菜及洗涤衣物器具”，“距井三丈以内不准设立厕所或安置粪缸”，“石井上应设置石盖或木盖，井口有低陷者，应从速修理，免致秽水流入”^{[2][743]}。

1936年，宁波夏令卫生委员会举行井水总检查，并委托华美医院对城区的28口公私水井的水质进行检查。检查结果为：从水色看，清的水井有13口，稍浊的水井有5口，浊的水井有9口，从气味看，有气味的水井有6口，臭的水井有2口，恶臭的水井有4口。（民国《鄞县通志·政教志己编》页744~745）从检查结果中可以看出，城区中的水质只是一般。这说明：宁波政府在饮水卫生的保护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还是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不是很明显。

四、结语

宁波政府通过对肉食卫生的监管、对店摊的卫生管理以及对饮水卫生的保护等三个方面来实施饮食卫生的管理。其中在肉食卫生的监管和店摊的卫生管理方面，效果是明显的，但在饮水卫生方面，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效果不是很明显。但总的说来，在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没多久，在宁波政府的支持下，宁波的饮食卫生工作还能取得一定的成绩，这一切实属不易。并且，宁波政府在当时环境下，所采取的政策与措施，对于我们当前更好地开展卫生工作提供一个很好的历史借鉴。就这点来说，研究民国时期宁波地区的饮食卫生管理状况，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宁波市月刊[J].1930,(3).
- [2]张传保等.公共卫生[A].民国鄞县通志(影印本).政教志己编[M].宁波:宁波出版社,2006.7.
- [3]时事公报[N].1930.
- [4]鄞县县政统计特刊(第二集)[J].1931.

孔伟 宁波大学文学院
(责编 樊誉)

(上接第5页)

人德效騫、法国布尔努瓦以及当代学者黄时鉴等的论说，结合现代动物医学的科学分析，最终确定“汗血”乃“寄生虫致病”。诸如此类的考证与辨析，使该书的结论建立在严密的论证之上，反映出作者考镜源流的学术功力。

三、以诗证史 拓宽史料的范围

如上所述，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一批批大宛等汗血宝马相继东入中原，以其超凡脱俗的体质和令人难以破解的诸多奥秘，受到人们的重视。其中，尤其受到许多史学家、诗人、画家等的极大关注。汗血宝马成为古代诗人赋诗吟咏的对象，也产生了大量以汗血宝马为题材的画卷。在作者的研究中，史料的选取不仅仅限于史书的记载，而是扩大取材的范围，将历代诗人诗赋对汗血宝马的吟咏和描述、绘画作品对汗血宝马的描绘、铜铸与石刻对汗血宝马形象的表现等，一一信手拈来，作为材料，体现出史料运用上以诗证史、以画证史之处。作者从《全唐诗》《全宋诗》《全金诗》《全明诗》中，将历代吟咏汗血宝马的诗歌作了梳理，以此证明古代中国对汗血宝马的认识。《汗血宝马研究》还借

鉴了许多考古学、美术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诸如陕西兴平县出土的西汉鎏金铜马、甘肃武威出土的铜奔马，是仿照汗血宝马的形象铸造的；“昭陵六骏”石刻马“白蹄乌”，是依据唐太宗坐骑汗血宝马“白蹄乌”所雕刻，唐代《照夜白图》画，是依据唐玄宗坐骑汗血宝马“照夜白”形象画成等。在全书资料运用中，既有历代正史的官方记载，作者又广泛搜集博物志、异物志、遗录、游记、见闻录、稗钞等野史文献中的资料，大力挖掘历代笔记、小说、传奇、歌谣、民谣中的相关资料，在加以诗词、歌赋、绘画、石刻、雕像资料佐证，从而使作者的研究有坚实的资料支撑，极大地拓展了史料的范围。

总之，《汗血宝马研究》是学术界首次系统论述汗血宝马的力作，作者以其独特的观察视角，为我们展示了丝绸之路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

潘春辉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 讲师
西北师范大学史地专业博士研究生
(责编 樊誉)